

# 序

赵 沅

“诗言志，歌永言”。

中国人曾用上述六个字——世界上最简练、最美丽的语言来论诗和歌（从《尚书·尧典》到历代不少的乐论和乐书都如是说）。

读槐华的诗，就为他的真情所感动；他的诗都是从心琴自然弹出来的，没有虚饰，没有一点儿矫情（他自己说是“苦吟派”，每首诗都经过无数次修改，但这和他的诗全是真情的自然流露并不矛盾）。

槐华把诗写出来了，但觉得还没有达到淋漓尽致程度，于是，把自己的诗有腔有调地唱起来了。这就是他的“自度曲”。我想，南宋姜白石大概也是这样的，他的歌和他的诗一样，也是自然而晓畅，是为了把意境更完美地表达出来，故而也是他的真情的更深一层的表达。

故而我又想起一句古人的话：“唯乐不可为伪”。

诗和歌是什么？

是对自由、春天、爱情和美好未来的歌颂；是对压迫、腐朽、虚伪、不公的无情的鞭挞；是对人生、人性的被压抑的反抗和呐喊；是对最美好的事物的向往的由衷的歌唱；……

诗歌有的狂风暴雨和雷电交加，有的浅吟低唱吐气如兰，这二者不可偏废，更无高下，人们凭着自己的爱好去不断地追寻自己的完美。

槐华的诗歌中，细心的欣赏者可以从中找到自己要找的东西。

我曾经在新加坡工作过一年，我很了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，那一代中华儿女的心态，他们纯真、朴实、有正义感，对先人的国度和居留地的人民，都有着热烈的情感，因此，他们喜欢诗歌，他们喜欢音乐，有的人拿起刀枪，为人民的事业而流血战斗；有的人拿起笔墨，为人民的事业歌唱终生。

灾难深重的旧中国人民，在帝国主义的欺侮凌辱下，北方的农民，只有“走西口”或者“下关东”；而南方的破产农民，也只有“卖猪仔”或“下南洋”。正是这几代的移民和当地人民一起，在热带的雨林、在湿热的矿井、在荒凉的山芭、在闷热的胶林艰苦求生、英勇奋斗……

遥望南天，感慨万千！

作于世纪之交，岁次庚辰，年方八四，仍客北京。

赵 沅（1916— ）1947年任香港中华音乐学院副院长（院长为马思聪）。这年年底在新加坡与新加坡爱华音乐社吴盛育、中国歌舞剧艺社社长丁波合办中华艺术专科学校，翌年2月1日开学，设戏剧、音乐各一班，任校长兼音乐系主任；后因“六·二〇紧急法令”，学校却仍然坚持到年底。1949年初（农历新年初一）被迫出走，返香港。自1956年历任北京中央音乐学院副院长、院长、名誉院长至1995年，现任中国教育部艺术教育委员会主任、中国音乐史学会会长、亚太音乐民族学学会荣誉会长。